



地域性特色写作的诗性表现

——浅析庞白散文诗集《唯有山川可以告诉》

□丘文桥



广西诗人庞白的散文诗集《唯有山川可以告诉》自出版以来，得到文学界的重点关注和认可，先后获得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首届“大湾”散文诗大赛散文诗集奖、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诗歌类提名奖等诸多奖项，其艺术性和独具特色的写作特点优异于一般常见作品，地域性特色写作散文

诗这一特点得到比较广泛认可，散文诗创作造诣由此可见功力非同一般。

庞白的散文诗作品始终贯穿广西的山川、河流等特有自然景观的描写，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述“写一本行走广西的散文诗”。在他的诗作中，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委屈与耻辱、骄傲与欢乐，留存山川、河流和土地深处，看不见，也能感受到”的全部用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充分体现出对广西物产、历史、人文，以及江河湖海等地方特色的痴迷，整本集子基本囊括了广西所有具有特色的风光物色，花山、大明山、西山、十万大山、大容山等信手入诗，除了庞白钟爱的大海，还有左江、右江、西江……星岛湖、澄碧湖等水系，兼具蕴涵着执着的广西地域性写作的气息，同时还有对这片土地独有的风情文化眷写。

作家与地域有着神秘复杂的关联性。地域性特点写作在《唯有山川可以告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庞白出生在广西，除了海员生涯外，他长期与海边土地朝夕相处，与这一地方的产物产生了特殊情感，他笔下的意象也必定与这块土地相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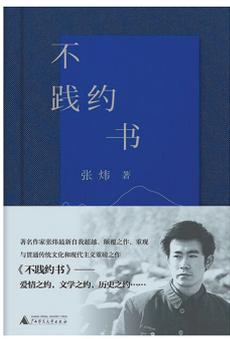
地域性特色写作，尤其是在以抒情为主的散文诗写作中的运用是非常复杂的综合能力的表现，在文字的驾驭上需要更深厚的语言功力。显然庞白做到了。说起庞白散文诗的地域特色，不得不说“文化根系”和“文化背景”。确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起广西，很多人就会想起桂林，诗人娓娓道来“桂林的电线杆，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像一些名字”（《车过桂林》）；当然也有广西独有的少数民族美景风物，“我的世界，在这个夜晚，只是程阳寨里一扇合不拢的旧窗”（《程阳寨里有一扇起伏的旧窗》），“再远，也有尽头，正如最近，也通向无限”（《药香中的金秀》）。除了群山和少数民族特色大放异彩之外，诗人更多的笔触描摹“山的故乡”——大海。正如他所言：“对于我来说，诗歌是另一种意义的大海。”的确如此，大海在庞白的散文诗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包括了总体性的想象，“他（庞白）的诗歌真正成了一种经验式写作，成为抒情的话语，存在的反思和内心的表意符号”（《庞白散文诗论》周根红），同时也有他作为海员经历的具象性抒情，集子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诗，如《向南，触摸大海》《水上人家》《海上生明月》等。

无论哪种形式的写作和表现，作为散文诗的写作者庞白而言，地域性写作只能看作是一种经验写作，无法用来对这册诗集中的诗歌做出价值评判。一个诗人的作品优劣与否，与地域性写作无关。庞白说：“要写什么，怎么写，有清晰的冲动，却一直只有模糊的计划”，因而，他选择了“乱写”，“放纵地写”，也正因此，他的写作动机更多是情之所至而为，而非技术性写作。庞白对广西的描摹顺理成章、浑然天成，诸如广西的山、水之南方特征，少数民族元素，甚至南方气候、氛围、气味的痕迹在作品中都不自觉地流露。

在庞白的这本诗集里，综合使用多种表达体式，有抒情、有哲理、有叙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得到比较完整的体验。如《只剩下风的声音》，有哲理的思考，也有前面的叙事铺垫，最后还有对猫儿山激越情感的抒发。类似这样的诗作例子很多，如《与一匹马相依》《云上的日子》以及他的海系列。

庞白的作品既有理性思考的严肃与冷峻，又有咏叹调式的浪漫与抒情，很多句子富含深意包含哲思。读庞白这本《唯有山川可以告诉》，又一次被他诗中散发的舒缓沉郁击中，这种感受不是谁都能写得出来的，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又再次例证散文诗是可以拥有大情怀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甚至在形式和内容上可以大胆实践和突破。庞白在《唯有山川可以告诉》中做到了。

小说家张炜《不践约书》： 一场突破忧闷困境的诗歌书写



“我们相约大雪天来河边/带上那双滑冰鞋/穿上紫红色连体套头衫/一瓶烈酒和一捧煮花生/纷纷扬扬，雪下得真大/微风一吹像白色焰火/幽暗的玻璃后面那些小眼睛/看一个落落寡欢的人/抿着嘴唇来回踱步，坐下/慢慢享受节日般的绽放……”

诗是语言的黄金，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一个优秀的

小说家，骨子里往往是一个诗人。张炜也不例外。2021年，张炜带给读者的第一本新作就是一部长诗——《不践约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诗是向爱人的倾诉

在这部作品中，张炜以爱情为呈现线索，作家调动人文、思想、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综合手段，以强大的精神背景和调动超出常人的写作能量，打造出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复合性诗歌文本，可以视为其代表作《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的立体全方位覆盖性诗意呈现。

长诗分为52节，是向一个视为知己的爱人的倾诉，一次精神告白，基于当下的回忆，逆时间之流任意回溯，来表达一个人在复杂多变的时代的探寻和追问。张炜的长诗一如浑厚的交响乐，时空大开大合，意象丰富，气势磅礴，节奏鲜明而又充满悠长的韵味，抒发对自然、人生和家园的爱与眷恋。

张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他直言诗是“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看来，“诗的时代是过去了，大行其道的应该是小说。小说的边界一直在扩大，但诗仍然居于它的核心。没有抓住诗之核心的文学，都不可能杰出，无论获得怎样多的读者都无济于事。”

二十多年来，张炜投入大量时间研读中国诗学，抚摸古典，叩击和倾听它们。这期间出版了五部古诗学著作，包括《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这被他视为研读的“副产品。”

在自序文中，张炜这样表达写作该诗的心路：“这部诗章虽然命名为《不践约书》，却实在是心约之作，而且等了太久。我深知要有相当集中的时间来完成它，还需要足够的准备。我已准备了太久。一场全无预料的瘟疫笼罩了生活，而且前所未有。多半年半封闭状态下的日子，实在是一场砥砺和考验。由忧闷到困境，从精神到肉体，持续着坚持着，直到今天。在这样的时空中，我似乎更能够走入这部诗章的深处；也只有这次艰辛痛苦却也充满感激的写作，才让我避开了一段漫长枯寂的时光。我珍惜这部诗章。”

受到专业人士好评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清纯——像一潭清水一样，像天籁的《声音》那样清纯干净的写作，慢慢地发展到像《古船》那样的厚重，像《九月寓言》那样的华丽，像《刺猬歌》那样的尖锐，像“高原系列”那样的宽阔，张炜的创作脉络是非常清晰的。2020年初推出《我的原野盛宴》，夏天又出版《斑斓志》，循着苏东坡的生命轨迹，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形象从历史尘烟中清晰地走出来；而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的50卷《张炜文集》，让读者更感知到作家思想与诗性的丰富以及创作历久弥新的奥秘，也为中国文学的阅读研究提供了绵密厚重的文本。作为一名50后，张炜的思考和书写能力，并没有因岁月的年轮而衰退，而是持续敏锐，持续勤奋，持续深刻，难能可贵。这就是2021年1月初，由华商报、封面新闻主办、组织评选的“名人堂·2020年度十大作家”，对上榜作家张炜的介绍和评语。

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张炜是作品“走出去”受到专业人士好评的少数之一。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说，在西方，张炜一直是个谜一样的人物。美国出版索引学会创会主席罗伯特·鲍曼说，“张炜是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他的诗性、语言的魅力，以及描写历史和现实的令人惊愕的真实，都打动了我。”法国著名学者、翻译家尚德兰也认为，以小说家著称的张炜的诗作，“同样是令人着迷的、值得珍惜的文字。在这特别的吟咏中，我们可以体会音乐的节奏、奇异的意境。语言和地域造成的晦涩并不能抵消和影响其另一种美丽与深刻。我们可以同意，张炜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京城的密码

——读邱华栋非虚构新著《北京传》

□李春雷



3065岁的北京，终于有了一张新名片。

这张名片上刻划着深厚的岁月沧桑，却又跳动着鲜活的时代色彩。

这是一部独属于北京的传记——《北京传》！

邱华栋新著《北京传》是一部献给北京的书。这部书巧妙地将记人写事的传记写法应用于对城市的记录与书写中，以文学之

笔写地历史之志。在作者看来，北京已不仅是一片地域，它像人一样拥有生命。北京像一位千岁老者，拥有自己历经岁月的故事。他需要述说，需要倾听。因此，作者在书中将人物传记的文学性、可读性以及方志的记录性与系统性相融合，用文学的笔调将北京化身为一个鲜活的人物，将大量的相关历史材料转化成一种亲近读者的文学性、讲述性的文学传记创作。无论是人物传记写作还是与地方志记录，这种写作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从时代角度来看，讲述城市历史的《北京传》是一种属于当前时代的创新写作。对北京进行人物传记式的创作，是顺应时代，反映现实，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重要创新。

《北京传》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将“北京”作为“传主”来结构整部作品。

以北京作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历来不在少数，但像《北京传》这样不局限于特定历史时段，着力聚焦于千年以来城市演变本身的作品却几乎没有。从民国开始，夏仁虎《旧京琐记》、《宇宙风》期刊社出版的《北平一顾》等作品追忆北平之繁华。林语堂《大城北京》、齐如山《北京杂忆》等以北京生活为题材，以散文抒情的怀旧心理书写北京。新近以来，洪烛《北京：皇城往事》、宁肯《北京：城与年》书写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北京。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以不同形式、角度对北京进行了书写。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北京传》相比，这些作品更多呈现的是北京这个舞台上的故事，而非舞台本身。在他们笔下，北京往往只是“舞台”“背景”。而在《北京传》中，作者以宏大的视野与历史观，立足北京自身，从城市空间生长、格局的演进变化入手，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和建筑、规划，综合勾勒了北京城三千年的前世今生。这在所有以北京作为书写主体的文学作品中可谓绝无仅有。

《北京传》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书写了北京自身。放眼世界，北京的首都属性以及它近百年来不可撼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让本书还有一种更为突出的重要意义——跨文化背景下的呼应与对话。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不仅收集大量关于北京历史的资料，还阅读了众多书写城市的传记类作品，如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西蒙·蒙蒂菲奥里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罗里·麦克林的《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等。《北京传》，展示了作者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多结构的知识体系。

从《北京传》的文本内容与创作缘起来看，作者具有纵深横广的历史视域。北京城三千年的历史凸显出作者纵越时间的视野，而与《伦敦传》《罗马》《巴黎》《柏林》等城市传记的对比参照，则体现出了作者丰厚的积累和横广的跨文化视野。不仅如此，《北京传》还展现了作者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本书不仅以时间为轴梳理北京城的演化变迁，还在空间视角下细致展示了北京城市地理与重点建筑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征引了大量建筑学、城市史研究、城市规划研究等社会科学层面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对这些研究材料进行了充分转化，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文学作品记述的流畅性与可读性。

在《北京传》中，作者以宽广的视野与严谨的态度，以纪实的文学笔法描绘出了北京历史起伏的画卷。在中国文学史上，纪实笔法古已有之，但《北京传》以非虚构的纪实写法，将传统记人写事的纪实笔法应用到对城市地域的书写中。这不仅仅是文化历史类纪实的一种创新探索，更是为当代纪实文学创作开拓了另一条道路和另一重视野，同时也昭示着中国纪实文学未来值得关注的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